

## 周作人宣传新村运动及其影响

倪墨炎

**内容提要**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周作人在“五四”前后宣传日本新村主义的活动，并认为周作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更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

周作人虽然不是政治活动家，但他也是寻路者。他想寻找一条合乎人道主义理想的救国救民的路。他很注意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形。他曾想去苏联考察，这事和蔡元培商量过，后来没有成行。当他听到日本新村的消息时，他很向往，特地著文介绍。他终于去了日本新村，并加入了新村，作为一名会员。

他先在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期，发表《日本的新村》。他是根据武者小路实笃所著的《新村的生活》一书的内容介绍新村的。周作人在文章的开头说，新村比托尔斯泰的主张已大大发展了，是更合乎理想，真是人类的福音。他说：“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汎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抹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汎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可见周作人对新村评价之高。

新村是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在日向（地名）选了一块地方，有20余人，实行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所谓“人的生活”。周作人在《日本的新村》中，引了许多武者小路实笃的话，来介绍关于新村的理论，例如：

“（理想）社会的造成，是将用暴力得来呢？还不用暴力呢？那须看那时个人进步的程  
度如何了。现在的人还有许多恶德，与这样的社会不相适合。”

“新时代应该来了。无论迟早，世界的革命，总要发生；这便因为要使世间更为合理的缘故，使世间更为自由，更为‘个人的’，又更为‘人类的’缘故。”

“对于这将来的时代，不先预备，必然要起革命。怕惧革命的人，除了努力使人渐渐实行人的生活以外，别无方法。”

十月革命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革命措施，同时对一些反动分子作了必要的处置，使相当数量的人道主义者觉得十月革命后，穷苦的劳动人民有了“人的生活”是好的，但布尔什维克进行暴力革命，不够理想，要是能和平实行“社会主义”，那真是人类的福

音。武者小路实笃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那么，他们的所谓“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再从周作人的介绍文章中转引几段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吧！

“人的生活是怎样呢？是说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

“我想人类不能享人的生活，是大错的。这错误从何而生，大约有种种理由。简单说，便是因为他们不明白人类应该互助生活；反迷信自己不取得便宜，即要受损失的缘故。所以心想别人的不幸应该永远忍受，只要自己幸福便好。”

“这便只是互助的生活。不使别人不幸，自己也可以幸福；不但如此，别人如不幸，自己也不能幸福；别人如损失了，自己也不能利益的生活。”

“我们想造一个社会，在这中间，同伴的益，便是我的益；同伴的损，便是我的损；同伴的喜，便是我的喜；同伴的悲，也便是我的悲。……世上以为若非富归少数者所有，其余都是贫民，社会便不能保存。对于这宗思想的错误，我们也想就用事实来推翻他。”

“各人应该互相帮助，实行人的生活。现在文明进步，可以做到使一切的人，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但实际上，现在为了衣食住在那里辛苦的人，还那么多，很是不好的事情。……据我想这最好的方法，只有各人各尽了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能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这一法。……这样我们才能享幸福的人的生活。”

“劳动也有几种，有我们生存上必不可缺的劳动，与不必要的劳动。现在将这必不可缺的劳动，专叫一部分的人负担，其余的人都悠游度日，虽说在现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决不是正当的事。”

从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人的生活”的理想是：一、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应该互助，而不应损人利己；二、人人都应劳动，不能一部分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要的衣、食、住。三、而这一切，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得到的，即通过和平的手段，可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而使人人平等。

为了宣传日本的新村，接着，周作人又写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周作人虽然没有说过反对暴力革命的话，但新村的“人的生活”的构想实在太合乎他当时的人道主义理想了。他对于新村的介绍，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次集中表现。他说：“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所谓“安全的生活”，就是人类不是相斗而是相助的生活。他说：“以前的争存，固然也有同类互助与异类相争，但同类中也一样剧烈的争斗。现在是想将生存竞争的法则加以修正，只限于人与自然力或异类的中间，若在人间同类，不但不应争斗，而且还应互助了平和的生活才是。”所谓“互助了平和的生活”，周作人解释说：“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谈到生活与劳动的关系，周作人进一步介绍新村的理想是：“人人有生存的权利，所以应无代价的取得衣食住，但这生活的资料，须从劳动得来，所以又应尽劳动的义务。”这种关系，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同。新村的劳动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义务，并非将力气来抵算房饭钱。如果说“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那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以一日劳动换得一日生存，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关于人的精神生活，新村是主张自由的，是允许发展个性的。周作人介绍说：“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这里所说的“小异”，就是指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周作人又说：“新村是个人主义的生活。”

总之，新村的人的物质生活有保障，而精神生活是丰富多采的，是允许个人发展自己的个性的。

当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在日向办起实际的新村时，周作人十分向往。1919年7月，他终于去日本日向的新村。7月2日，他离开北京，由塘沽东渡，6日到门司，7日到了日向。在马车行门口，一位穿劳动服装的人近前向他问道：“你可是北京来的周君么？”答：“是。”那人便说：“我是新村的兄弟们差来接你的。”接着又有两人迎上来同样的自我介绍，十分亲切。这使周作人很感动，他简直觉得好像感受到的“同类之爱”。他说：“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

在去新村的路上，周作人遇到了不少新村的人，包括武者小路实笃。晚上住在武者家里，大家纷纷向他介绍新村的情况，直到深夜12时，才各散去。这一日他身体很疲劳，精神却极舒畅，所以睡得非常安稳，一觉醒来，隔壁农家的妇女，已都戴上圆笠，将要出发工作去了。

8日，他和武者到“村”里各处走走。新村的所在，本是旧城的遗址，仿佛一个半岛，山川如铁蹄形，风景优美。这里有农家旧草舍改建的公共住室、厨房、图书馆等等。又有不少人和他交谈，介绍新村情况，直谈到晚间12时。

9日，周作人参加了劳动——在种过小麦的地里种甘薯。周作人脱去了外衣，单留下衬衫和短裤、布袜，去掘地。不到半小时，他腰已痛，右掌上又起了两个水泡。他只得放下锄头，到豆田拔草。后来又去种薯苗。他还和新村成员一起，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他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这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极大的喜悦。他根据亲眼所见，认为：“新村的生活，一面是极自由，一面却又极严格。村人的言动作息，都自负责任，并无规程条律，只要与别人无碍，便可一切自由；但良心自发的制裁，要比法律严重百倍，所以人人独立，却又在同一轨道上走，制成协同的生活。”在周作人看来，真是十分理想的生活。

周作人终于加入了新村，并交纳了会费。新村有两种会员：凡愿入村协力工作，依本会精神而生活者，为第一种会员；真心赞成本会精神，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实行此种生活者，为第二种会员。第一种会员的义务、权利，一律平等，共同劳动，平时衣食住及病时医药等费，均由公共负担。第二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应每月捐金50钱以上，“以忏悔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周作人是第二种会员。在他此后的日记上，还不断有交寄会费的记录。

周作人的这次日本之行，是先到日向新村，然后再到东京妻子羽太信子家，可见他一睹新村的迫切心情。他于7月16日才由日向到东京，途中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四处的新村支部。8月10日，他带着信子、孩子和妻弟重久回到北京。他的一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到此才告一段落。

早在东京时，他就写好了《访日本新村记》。回国后，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这篇访问记中有些重要的记载，可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新村的性质和周作人当时的思想状况。他写道：

新村的土地，总共约八千五百坪，（中国四十五亩地余）；住在村里的人，这时共十九人，别有几家，因为省亲或养病，暂时出去了。畜牧一面，有母马一匹，山羊三头，猪两只，狗两只，此外还有家鸡数种。……现在村中的出产，只有鸡卵，却仍然不够供给，须向石河内（地名）田家添买；当初每个一钱五厘，后来逐渐涨价，已到四钱，这一半固然是物价增加的影响，但大半也因为本地人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有钱人，聊以种田当作娱乐，不妨多赚几文的。此地风俗本好，不必说新村，便是石河内村，已经“夜不闭户”，甚可称叹；只有因袭的偏见，却终不能免，更无怪那里官吏和批评家了。石河内区长也有几分田地在下城，新村想要收买，区长说非照时价加倍不可，其实他钱也够多了，何必更斤斤较量，无非借此刁难罢了。……

新村的农作物，虽然略有出产，还不够自用，只能作副食物的补助。预计再过三五年，土地更加扩充，农事也更有经验，可以希望自治，成为独立的生活；这几年中，却须仗外边的寄赠，才能支持。每人每月米麦费六元（约中国银三元半），副食物一元，零用一元，加上一切别的杂费，全部预算每月金二百五十元。这项经常费，有各地新支部的赠金，大略出入可以相抵；至于土地、建筑、农具等临时费，便须待特捐及武者先生著作的收入等款项了。我在村时，听说武者先生的我孙子（地名）新筑住屋，将兵卖去，虽然也觉可惜，但这款项能有更好的用途，也没有什么遗憾。新村本部设在日向，其余东京、大阪、京都以至福冈、北海道各地，都有支部，协力为新村谋发展。……

从这些记载，使我们了解了新村的实在情况，同时也可发觉新村存在的问题，如一，新村并不能自身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饭食也不能自己解决，主要靠各地的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又如二，新村在上层人士中，如那位有房产的区长，没有得到支持；在下层人民中，也没有能得到理解，如“本地人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有钱人，聊以种田当作娱乐”。又如三，新村的人和外界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关系，如有的人在新村，家属都在村外，如武者的家产、稿费，也是从外界得来的，这都说明新村不可能是世外桃源。可见，武者小路实笃等人，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不满于人压迫人的现实，但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的“飞地”，这是乌托邦的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在十月革命后，新村的理想主义者提出非暴力的主张，对正确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然会带来消极影响。这点也是不应忽视的。后来新村不能再维持下去，终于解散了。

周作人不但写文章介绍新村的情况，还于1919年11月8日在天津学术讲演会作题为《新村的精神》的讲演。讲演稿后来发表于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上。周作人再一次介绍了新村的根本。他说：新村的目的是在于过正当的人的生活。其中有两重要的根本上的思想：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人，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虽然周作人看到了一些新村的现象，但他看不到新村是不可能实现这些要求的。

周作人对于日本理想主义的新村的衷心向往，热情支持，大力宣传，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反映了他世界观的重要方面。

在五四时期，各种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被介绍到中国来，一时思想界舆论界十分活跃。一些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人，还力图把他们认为是真理的思想付诸实践。以日本武者小

路实笃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主义”——它的理论和实践，经周作人和其他一些人的宣传，有着广泛的影响。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乃至胡适，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新村主义的思想。根据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加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的影响，中国少年学会的部分会员和新潮社的部分会员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著名人士的支持。正在北京筹备设立新村支部的周作人，更热心地支持这个活动的发展。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于1919年11月。出面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国少年学会的骨干王光祈和新潮社骨干徐彦之。据《工读互助团简章》说明：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简章规定：团员每日每人必须作工4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作工钟点。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书籍用后归团体所有。凡团员有怠于作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到12月，陆续有一些人报了名。工读团分为三组：第一组27人，设在北京大学附近，营业要目是（一）素菜食堂，（二）石印及装订，（三）洗衣；第二组19人，设在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大学附近，营业要目是（一）素菜食堂，（二）洗衣，（三）制造小工艺（如浆糊、墨水等）；第三组人数未定，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本组全由女子组织），营业要目（一）编织，（二）小工艺。三个组的开办费约需一千元。这笔钱从那里筹集呢？决定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出面募捐。

在1919年12月下旬或1920年1月初的北京出版的一些报刊上，登出了《工读互助团募捐启事》。今据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期所刊载的全文，抄录于下：

###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亦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 李大钊 陈独秀 蔡元培  
胡适 周作人 顾兆熊  
陈溥贤 王星拱 高一涵  
张崧年 程演生 陶履恭  
李辛白 孟寿春 徐彦之  
罗家伦 王光祈

关于缴纳捐款等事，请与北京大学新潮社徐彦之君接洽。

这份募捐启事发表后，捐助者不算少，共募集980元。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来分为四个组展开

了活动。

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进步人士都寄予极大希望。蔡元培在1920年1月1日的《时事新报》增刊上发表《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他说：“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都是。所需有两者：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没有。”蔡元培认为，普及高等教育，是和平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上法。因而他十分重视中国工读互助团。他在1920年1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办发表的《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认为全国各地如果都办起工读互助团，那“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

这些思想和周作人的思想是颇一致的。只是周作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更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正当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在北京知识界作为一件新鲜事议论纷纷之际，周作人也忙碌了起来。据他日记所载，1919年12月10日，“下午往校，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六时散”。这次会很可能是讨论那份募款启事的。12月23日，“捐工学互助团银十元”1920年1月7日下午，他去工读互助团参加会议。1月18日写《新村运动的解说——答胡适先生的演说》，对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说中对新村提出的质疑作了答辩。周作人此文发表于1月24日《晨报》和1月26日《民国日报》。1月23日，“晚工学互助团孟君持仲甫函来访，嘱明日讲演”。第二天下午，他应邀“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并发表了演说。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29日下午，他又去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参加会议。周作人还和第一小组、第二小组、第三小组、第四小组保持着通信联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工读互助团的活动趋于高潮的时候，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正式成立。为了扩大影响，他还特地在《新青年》等报刊上登载了启事：

#### 新村北京支部启事

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支部地址及面会日期如下：

北京西道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宅，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

但是工学互助团的活动很快进入了困境。到1920年3、4月间，各工读小组就不能再继续开展活动了。把工学互助团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试验，它的失败是命里注定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要建设一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飞地”，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作为一种勤工俭学的活动，工学互助团之所以失败，是团员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泛滥，无法进行集体主义的劳动。而且，中国社会的普通劳动力是廉价的，团员们的半天劳作不足维持他们的生活，更不要说支付高等教育的费用了。工学互助团的三、四个月的活动，

把募集来的近千元费用花完，也就结束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胡适、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总结经验教训。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中认为：工读互助团要把它作为新组织、新生活，“挂什么金字招牌”，所以失败了；如果只是作为勤工俭学，“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美国至少有几万人做这事”，是可以成功的。李大钊在给陈独秀信中（发表时题为《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则说：“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我们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贾小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那里能够？……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李大钊认为在城市里组织集体劳动是失败的原因，不如改为单纯的勤工俭学活动。至于要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的试验，可到农村去进行。李大钊当时正从民主主义者向启蒙共产主义者过渡。他对日本新村的做法，并不抱否定的态度，多少还接受了它的影响。陈独秀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中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因为组织得不好，是“人的失败”不是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希望各地的工读互助运动不要停顿下来。当时天津、上海也在筹备工读互助运动，但事实上不可不受北京失败的影响而停顿下来。

周作人也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并不能影响对于新村主义的信仰。他在1920年3月28日出版的《工学》第1卷第5号上发表《“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一文，回答人们对新村提出的问题，再一次表示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信仰。他仍然积极开展新村支部的活动，接待了不少来访者。

周作人于1920年4月7日接待了来访者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也是寻路者，正在探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来访问新村支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新村的情况。

这时期可说是周作人宣传新村主义的高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日本新村运动没有什么发展而且走上了下坡路，加上周作人政治热情的衰退，他也不大宣传新村运动了。但他当年宣传新村运动并在中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所不应忽视的。

（上接第28页）

节令人那伤感的景象：

院外浓云合，微寒欲雨天，  
残梅三两树，如雪落窗前。

还有以心写物的。如席佩兰的《蝉声》，诗人在写蝉同时也在写人，她从断断续续的秋蝉联想到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自己正在渐渐变老。“凉飕送孤响，不定是何枝？断续成三弄，缠绵引一丝。莫更看明镜，先防鬓影衰。”

由于她们运用了多种艺术手法，所以尽

管有的作品题材、主题大致相同，却同样能够吸引人，给人以美好的艺术享受和耳目一新的感觉。她们的创作实践，丰富了清代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并且对以后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对以后妇女诗歌的创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

袁枚极力扶植的妇女诗歌运动，参加的人数多，创作的作品多，产生的影响大，对紧锢的文坛，对虚伪的道学，都是一个极大的冲击。他倡导的妇女诗歌运动在我国的文学史上应有一席之地不容忽视的地位。